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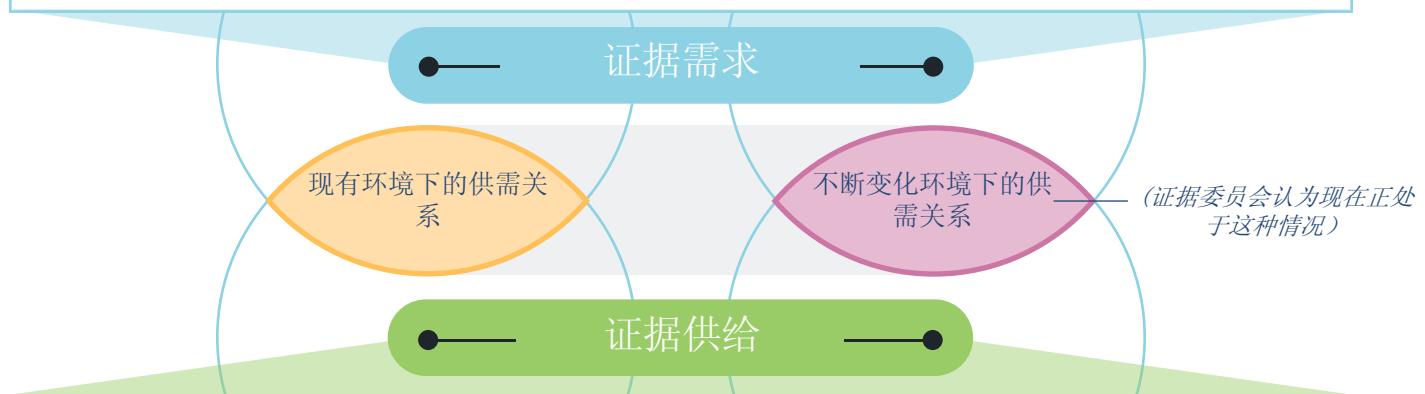
5.4 证据中介的促进与阻碍条件

一些促进和阻碍证据中介的条件在其控制范围内（例如，决策者对证据的需求与研究人员对证据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其他条件则仅在其影响范围内。能力、机遇和动机的简单行为框架可用于确定能够帮助证据中介的条件。(2) 每一个条件的缺失通常都会阻碍证据中介的发展。

具备相应的能力可能更容易入门促进证据中介的方法。但是，第四章所述的与证据综合有关的能力类型（例如，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证据）却非常缺乏。许多大学并不要求培养这种能力，因此拥有博士或其他高级学位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必要的技能。

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也可能较为缺乏。(3) 我们可以采用贝叶斯推理的形式在特定环境下对证据定义进行判断（正如第4.7节所述）。理想情况下，这种判断既要谦逊（例如，基于对当地-国家或次国家-环境的分析，我们可能需要降低对“什么有效”以及如何将其提供给需求者的确定性），又要具有同理心（例如，我们可能还需要根据追求公平的群体如何看待“我们的”证据，以及他们如何描述自己的认知方式来降低我们对证据的确定性）。在本节末尾，我们将针对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的特定案例，描述以谦逊和同理心做出政策判断所需的其他类型的能力。

- 获取、评价、改编和应用证据的能力包括以下几种：
 - 如第四章所述，区分高质量与低质量证据（以及从“其他证据”中区分出最佳证据）
 - 以谦逊和同理心判断证据在特定环境下的意义（例如，判断证据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重新绘制关于挑战的“心理地图”以及解决挑战的方法）
- 使用证据的机会（例如，机会窗口、支持性结构和流程，以及行动时间）
- 使用证据的动机（例如，内在动机和（或）激励决策者）



- 以新的最佳证据响应决策者和中介需求的能力，包括平衡响应性与严谨性的能力
- 生产所需证据的机会（例如，了解自己相对优势领域内对证据的需求，确定机会窗口，获得支持性证据中介，以及拥有必要的时间）
- 生产可以被理解和采取行动的证据的动机（例如，内在动机和（或）被激励的证据生产者；在学术环境中，激励措施可能与调整同行评议资助和出版物有关，以支持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和（或）支持证据使用的活动）

在现有环境中

- 以最佳证据响应决策者需求的能力包括以下几种：
 - 确定对证据的需求
 - 根据需求匹配正确的证据形式
 - 获取证据（或为产生证据提供支持）和评估证据
 - 将其进行综合并传达给决策者
 - 通过协商对话和其他方式为在特定环境下对证据意义的判断提供支持
- 支持证据使用的机会（例如，了解对证据的需求和机会窗口，获得支持性结构和流程，并有时采取行动）
- 支持证据使用的动机（例如，内在动机和（或）激励中介；在学术环境中，激励措施可能与同行评议资助和出版物有关，以便对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和（或）支持证据使用的活动给予重视）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 建立更多证据使用案例，并优化支持性结构、流程和激励措施的能力，其中包括以下几种：
 - 通过第5.3节所述的实例共享、演示、内部评审和外部比较来构建案例
 - 设计和实施（或调整）、确定优先级和共同生产（包括动态证据产品）、综合和“推动”、“促进拉动”和交流相关的结构、流程和激励措施
 - 将与互补性结构、流程和激励措施的联系常规化（例如，在创新和改进系统中）
- 增强证据使用制度化和高效能证据支持系统的机会（例如，机会窗口和行动时间）
- 促进证据使用制度化和高效能证据支持系统的动机，这可能依赖于内在动机，而非激励

除了与证据综合相关的能力外，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人还需要四种其他类型的能力，用以判断证据在特定环境下的意义。

政策分析

厘清政策问题及其原因，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确定实施方面的考虑因素（我们在第4.4节中讨论）

系统分析

了解谁可以就当前挑战做出何种类型的决策（治理安排），应对当前挑战的资金如何流动（财务安排），以及如何努力应对当前挑战（例如，项目、服务和产品）以惠及需求者（交付安排）；并了解哪些系统安排可能需要改变

政治分析

明确是否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行的政策和有利的政治活动（例如，机会窗口），以便立即采取行动；并确定若当前并非最佳时机，如何才能打开机会窗口



利益相关者参与

了解将参与任何决策或受其影响的广泛人群如何看待政策问题及其原因、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和关键实施考虑因素，以及他们认为针对不同群体采取的下一步计划；理想情况下，这种参与以证据综合和上述政策、系统和政治分析为基础，但也对其他认识和思考方式持开放态度，并得到利益冲突政策和程序强有力的支持。

现有框架有助于进行系统分析，如卫生系统证据（Health Systems Evidence, HSE）分类和社会系统证据（Social Systems Evidence, SSE）分类；也有一些框架有助于进行政治分析，如“设置议程、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框架。



证据中介, *Kerry Albright*

是一位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国际公职人员，激发对知证决策和系统思考的热情，并帮助了解证据对国际发展的价值

我想对我们在使用证据解决社会挑战方面共同取得的多次成功表示庆祝，无论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还是疫情期间，并鼓励我们所有人现在加倍努力，将目前进展顺利的事情制度化，并在其他领域做出改进。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在联合国系统的不同部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支持成员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使用证据、在联合国规范性指南和技术支持中使用证据，以及充分利用与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者的伙伴关系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众多部分的主题。

在证据提供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两点。首先，研究人员在促进单一研究（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研究，影响的案例研究通常与增加的大学资金相关）和促进证据体系（包括“竞争对手”的工作）之间存在矛盾。正如我们在**第22和23条建议**中所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学术机构和期刊创造的激励措施，以确保未来我们支持对证据体和开放科学的关注。其次，对于证据中介来说，在区分不同形式的证据和寻找能够捕获更全面方法的语言之间存在矛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实施研究的定义，该定义涉及由决策者共同领导的证据生成和使用，并融入决策的所有步骤（不仅仅是**第4.2节**中的步骤3），包括纳入适应性规划，并结合**第5.4节**中描述的各类互补系统和政治分析，以及我所说的更广泛的情景分析。这种情境分析包括对文化、关系和权力差异的分析，还可以利用诸如情境分析、社交网络分析和权力分析等工具。

“